·教育学研究·

DOI:10.20004/j.cnki.ujn.2024.06.014

功能整合:社会秩序维续的教育角色

常亚慧,刘小芬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陕西 西安 710062)

[摘 要]现代性不仅给个体带来身份认同的困扰,也在不断拷问社会秩序的困境。面对现代性的秩序困境和个体困扰,结构功能主义从社会分工、系统分化、角色分类三个维度深描关系交织中社会秩序维续的发展脉络。研究植根中国语境,廓清结构功能主义在理论演绎中的限度,藉由功能性、认同性、结构性整合策略,阐释了集体意识、共享价值、社会期待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的整合功能,尝试探寻教育在此过程中的角色和地位,进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话语体系,探寻一条中国式现代化的教育实践之路。

[关键词]现代性;社会整合;结构功能主义;教育功能;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G40-05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24)06-0153-10

一、问题意识

现代性发端于社会结构转型,凭借其理性逻辑等力量,在社会各领域急速漫延,促成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为人类创造机遇的同时,也生发了社会结构的复杂与多维。现代性的祛魅化、理性化过程①瓦解了稳固的秩序,使现代社会呈现出"时—空延伸"的流动特性,人们摆脱了固有的规则控制,从有限时空中"脱域"②。主体意识的觉醒与个人主义的彰显使得个体经历由"身份"到"契约"的革命性转变,彻底打破了传统等级制度和共同体的束缚,为个人自由创造了自主与流动的空间,重构了人与自然、社会、世界关系的认知图景。然而,这种变化也带来了诸多挑战,工具理性的过度渗透与个人主义的日益膨胀,使得现代人的公共生活逐渐被原子化的利己主义所侵蚀,人们过度聚焦于自我实现和自我价值,被置于一种精神匮乏和价值混乱的危机之中,在追求物欲的过程中迷失方向,陷入复杂而深刻的身份认同困扰。社会成员被外在的目标、效率以及量化原则所操控,甚至屈从于资本逻辑,一味追求自我价值、利益的最大化,而忽视了对社会总体利益的考量,致使紧密的社会联结被逐步消解,削弱了社会团结与凝聚力的根基③。需要警惕的是,工具理性的迅猛扩张使社会组织乃至国家也被效率、经济发展驱动,极大地改变了现代社会的运行轨迹与社会主体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古都城市传统教育空间的变迁传承与保护研究"(项目编号:23STA037)。

[作者简介]常亚慧,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邮箱:yahuichang@126.com;刘小芬,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

①汪民安:《现代性》,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5页。

②安东尼·吉登斯著;赵旭东,方文,王铭铭译:《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1-22页。

③周来顺,高岩:《从完美秩序的追寻到文化理论的实践——齐格蒙特·鲍曼对现代性危机超越路径的探索》,《国外理论动态》,2023年第3期。

的生存状态,威胁着传统价值体系的稳定。在新旧价值体系交替之际出现的“真空地带”,致使情感异化、价值迷失,引发社会道德失序,失范行为频发[①]。社会发展背后的资本逻辑为不同群体间构筑起一道日益扩大的鸿沟,贫富差别、城乡差异、区域差距在资本的推拉下不断撕扯,社会流动性受阻,对社会秩序整合产生消极作用。流动的现代性促使国家权力从不同职业和社会子系统中“退场”,制度认同度、社会信任感降低,侵蚀着社会的团结统一。“现代性症候”造成了社会结构分化与整合之间的张力失衡,催生出社会关系疏离、价值认同缺失、结构性断裂等难题,给社会秩序维续带来挑战。社会秩序作为人类社会存续与进步的基石,旨在追求社会结构各要素间通过有序互动来达成相对均衡稳定的状态[②]。厘清社会秩序在现代社会复杂环境下的建构逻辑,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议题。既有研究将社会秩序嵌入西方社会学理论框架内,对不同理论流派的秩序观点进行耙梳[③],在理论考量的基础上,深入讨论了中国社会秩序的重建路径[④],呈现出社会秩序建构的多元面向,但在社会秩序维续机制的建构逻辑及其与现代性实践的“对话”等方面尚需深入探究。面对西方现代社会生存境遇的“现代性困境”,结构功能主义提供了系统性的社会秩序整合方案,即社会结构作为满足社会基本功能需求的复杂自适应系统,对个体进行规制与引导,维持系统内各子系统间有机调节,以维持社会秩序的动态平衡[⑤]。在此社会秩序的维续中,教育被寄予厚望,担负着重要的社会整合功能,强化着既有的社会与政治秩序[⑥]。涂尔干最先将教育纳入“现代性工程”中,认为教育可作为宗教的替代物,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促进社会整合的作用[⑦]。但由于缺乏对社会冲突和社会变迁的讨论[⑧],使其主张均衡平等社会状态的美好夙愿不乏“乌托邦”色彩。同时教育在面对现代性挑战时自身也在经历深刻变革,作为联通社会与个人,塑造“社会我”以维系社会秩序的“后发优势”功能有待进一步挖掘。需要深入功能理论的社会情境与历史脉络中,在中国社会结构中廓清社会转型发展的现实概貌,探寻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发展与命题延续的内生力量,探索适应于中国国情的社会整合策略,洞察教育所蕴含的强大整合功能,阐明教育在现代社会秩序中的独特适应性,使其成为保障社会秩序稳定的积极力量,以期达成社会学最终目的——使社会处于良序之中[⑨],为社会秩序的构建提供中国的理论话语阐释,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教育实践挺膺担当。

二、分合相济的路径探赜

现代社会正是在不断地分化与整合中发展与演进的,然而分化与整合的非同步性、不均衡性易导致社会成员、社会组织与国家间出现结构性紧张。面向西方现代性危机,结构功能主义通过考察社会分工中的社会团结、系统分化中的价值策略以及角色分类中的社会互动,剖析社会问题并探寻消解危机的可能路径。

①埃米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4页。

②《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353页。

③李钧鹏,许松影:《秩序问题引导的社会学思想史》,《浙江学刊》,2023年第6期;Grothe-Hammer M. ,Berkowitz H. ,Unpacking Social Order:Toward a Novel Framework that Goes Beyond Organizations,Institutions,and Networks,*Critical Sociology*,Vol. 50,No. 7-8,2024,pp. 1399-1420.

④鲍宗豪,赵晓红:《现代性视域下的中国社会秩序重建》,《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⑤刘润忠:《试析结构功能主义及其社会理论》,《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⑥程天君:《从“教育/社会”学到“教育社会”学——教育社会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7年第2期。

⑦钱民辉:《当代教育社会学研究的核心主题及理论建构》,《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年第1期。

⑧杨善华,谢立中:《西方社会学理论》(上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0页。

⑨来去:《秩序:社会学理论的核心——兼谈社会学与社会稳定》,《社会》,1990年第6期。

(一)重建制度的道德权威

受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思潮影响,社会学自诞生之初便以生物有机体的隐喻来阐释社会结构[①]。孔德、斯宾塞、涂尔干等古典社会学家洞察到社会内部的分化—整合过程恰似生物细胞的分裂和重组,在这一过程中,等级制度规范、集体意识等确立了具有"结构性地位"的社会秩序,并通过时空的"束集"维持稳定[②]。传统社会向现代及后现代社会转型时,劳动分工被视为社会团结的基础,构建了新的社会联结纽带[③]。孔德藉由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串联社会结构,将结构异质性增强、相似性衰微的事实视为病态现象[④],呈示出对个人主义高涨及传统秩序崩塌的忧虑。涂尔干则重点分析社会总体,将同质性机械团结向异质性有机团结的转变视为正常现象[⑤],分工的深化在满足社会整合需求的同时增强了个体间的相互依赖,塑造着复杂社会关系网络,但也加剧了个人自由与社会控制的张力。集体意识作为维系社会团结、对抗个体化倾向的关键力量,强调"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总和"[⑥]。集体意识宰制着社会生活,在制度领域衍生为物质力,借助法律规范或纪律准则、教育规范惩处和威慑个体失范行为;在道德领域内凝聚为精神力,凭借习俗、道德规范、职业伦理等引导个体反思调适其行动取向。随着组织结构的变迁,由血缘、地缘联结的社会关系逐渐被契约与交换所构建的有机团结所取代,个体不再拘泥于对集体意识的绝对服从,开始在行动空间中发展"个体我"与"社会我"。涂尔干批判功利主义的契约关系违背个体作为"社会人"的本性故而需要在异质性基础上重塑集体意识与规范,这是解决现代社会危机的关键[⑦]。为遏制个人欲望的无限膨胀、利己主义与个人主义肆虐、经济领域职业伦理缺失等社会失范的突出病症,涂尔干将治愈社会失范状态的希望寄托于职业群体的伦理建设[⑧]。现代工业社会发展过程中,作为传统道德权威的家庭已难以维持社会整合,国家亦无力独自解决现代社会的所有病症。职业团体成为沟通国家与个人关系的"中介通道",在促进职业身份认同、职业精神追求以及共同体归属感形成、特殊与普遍利益的统一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涂尔干所描绘的社会有机体在社会团结中的存续和发展依赖于教育的"社会化"功能,教育目的即协助儿童接受社会集体意识所确认的共同价值,并促进社会整合[⑨]。社会化功能赋予个体一套包含道德、习俗或职业传统、各种集体信仰等观念、情感和习惯的综合人格[⑩],道德教育被视为现代性问题的具体解决方式。

依靠道德教育,个体纪律精神得以培育,对群体依恋感与认同感获得提升,自愿遵从道德权威,以超脱个人的社会或集体存在为道德目标,依循集体利益而展开合乎道德的行动[⑪],道德教育也匡助个体和社会应对行动的越轨、失范和集体情感缺失等困境。孔德、涂尔干与斯宾塞一道从社会有机体视角审视社会分化,将社会结构视为各部分协调运作的组合体,把分化看作促进社会整

---

①周怡:《社会结构:由"形构"到"解构"——结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之走向》,《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3期。

②吉登斯著;李康,李猛译:《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页。

③埃米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第26、219、324页。

④埃米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第26、324页。

⑤E. 迪尔凯姆著,狄玉明译:《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30页。

⑥埃米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第11页。

⑦杨善华,谢立中:《西方社会学理论》(上卷),第130-131页。

⑧肖瑛:《法人团体:一种"总体的社会组织"的想象涂尔干的社会团结思想研究》,《社会》,2008年第2期。

⑨谭光鼎,王丽云:《教育社会学:人物与思想》,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1页。

⑩埃米尔·涂尔干:《教育及其性质与作用》,张人杰主编:《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9页。

⑪爱弥尔·涂尔干著;陈光金,沈杰,朱谐汉译:《道德教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0页。

合的动力机制[①],这种从社会整合方式或社会团结类型的研究方式或功能性分析,后来被帕森斯继承并进一步发展。

(二)统合规范的价值共识

帕森斯关注高度分化的社会结构及其功能[②],社会分工深化促使社会结构显著分化,功能层面呈现多元化特征,这一视角区别于经典社会学家以总体社会结构为分析框架的秩序建构途径。他强调功能互补与共享价值观在解释现代社会与制度运作中的核心作用,视社会结构与功能的双重分化为社会发展的关键动力,并将分化程度作为衡量不同国家社会发展阶段的标准[③]。帕森斯认为社会系统趋向于分化为不同的子系统,按照AGIL图式,任何社会系统都履行着由对外—对内功能与手段性—目的性功能这两组范畴组合而成的四种基本功能:适应功能、达鹄功能、整合功能、模式维护功能,四种功能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对本系统及隶属于其中的大系统的生存与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④]。这一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系统的自我调节、互相支持机制,为探析子系统发生变化时,社会总体平衡的维持或恢复提供了洞见[⑤]。为保持社会系统的良性运行,各子系统凭仗最低程度的一致性和相互依赖性实现交叉互动[⑥],社会拥有能够将社会成员整合在一起的共同价值体系则是其充分发挥功能的关键[⑦]。共同价值规范协调社会成员的需求和利益目标,使其构建出和社会相适应的"行动策略",进而保证各子系统保持适度的分化与整合。面对霍布斯的秩序问题,帕森斯沿着涂尔干的集体意识理路,将秩序划分为规范性秩序和实际秩序,良好秩序的维持意味着遵循共同价值导引的规范体系行动,共同价值体系被界定为一种可供选择的态度标准的共享符号系统[⑧],强调了社会结构对行动的参照性规范作用。与集体意识的客观外在性不同,帕森斯将共同价值视为行动规范性取向的内在实体,透过社会化内化为行动者自觉意识,发挥社会整合功能,制衡社会结构的过分决定论与自由意志间的张力。在秩序问题的解决方案中,帕森斯更注重剖析行动者的主观意愿、社会子系统价值取向及其功能作用,在综合韦伯、涂尔干、帕雷托、马歇尔等理论家的思想基础上,构建了唯意志行动理论,藉由涂尔干的总体性分析视角和韦伯的"社会行动"概念,将社会行动分解为牵涉动机和价值取向的单位行动,阐明行动系统内各因素间的相互关联[⑨]。

任何行动系统包含文化、社会、人格系统[⑩],通过社会化手段,文化系统作为一种模式化符号系统被内化于人格系统中,成为规范化行为模式体现在社会系统中[⑪]。帕森斯在涂尔干对教育社会化功能"应然"研究的基础上,从"实然"角度考察教育的社会化功能,在深入剖析班级功能后,赋予教

---

①E. 迪尔凯姆著,狄玉明译:《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第130页;埃米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第242-246页。

②刘少杰:《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44-145页。

③刘少杰:《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第149页。

④鲁思·华莱士,艾莉森·沃尔夫著;刘少杰等译:《当代社会学理论:对古典理论的扩展》(第6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3页;吴康宁:《教育社会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427页。

⑤Ormerod R. , The History and Ideas of Sociological Functionalism: Talcott Parsons, Modern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the Relevance for OR. , *Journal of the Operational Research Society*, Vol. 71, No. 12, 2019, pp. 1873-1899.

⑥刘少杰:《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第140-144页。

⑦周怡:《社会结构:由"形构"到"解构"——结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之走向》,《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3期。

⑧帕森斯著;张明德,夏遇南,彭刚译:《社会行动的结构》,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419-427页。

⑨乔纳森·H. 特纳著;邱泽奇,张茂元等译:《社会学理论的结构》,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38-42页。

⑩Talcott Parsons. , *The Social Syste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51, p. 6.

⑪乔纳森·H. 特纳著;邱泽奇,张茂元等译:《社会学理论的结构》,第35-41页。

育的主要功能亦为社会化,指出学校是一个典型的社会化机构[①],学校教育处于具有模式维持特性的文化系统中,承担着将社会价值观念内化并使其制度化的功能。帕森斯所指称的社会化,就是角色学习,通过教育,受教育者习得履行社会角色所必需的责任感、技能[②],自愿信守规范,从而缓解社会成员之间紧张的互动关系。

(三)契合互动的角色地位

为了阐释社会成员间角色互动的稳定模式,帕森斯将"地位—角色"作为社会系统中被组织起来的最基本分析单位,地位指涉行动者在社会系统中所处的结构性位置,角色则意味着与该地位相关联的行为期待。帕森斯认为社会互动实质上也就是一系列具有不同"地位—角色"规定性的行动者之间关系互构的表现形式[③]。整合社会结构要求的价值模式和行动者诉求的需求倾向是社会学的基本动力学原理,共同的价值体系服务于社会需要,个体在社会实践中契合主流价值观的程度决定其社会地位的评价与划分。个体地位高低的评估取决于与社会主导价值观相一致的共同价值体系,故而为了寻求地位,个体行动者以满足社会期待与需求为行动动机,努力契合主流价值,通过持续学习并适应社会的角色期待、标准化要求,以实现与社会的良性互动[④]。与帕森斯单一角色的社会适应视角不同,默顿引入了"角色丛"和"地位丛"两个概念,用以描绘个体在社会中所处地位与扮演角色的复杂性,社会角色、地位之间并非简单的对应关系,处于某种社会地位的人往往扮演着多重角色。面对多种"地位—角色"的矛盾,个体不仅要经常调整因社会关系不同引起的社会地位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角色转变意识,还需理清和自己发生关系的各种角色丛[⑤]。在社会生活中,秉持"个体我"和"社会我"双重性格的社会成员穿梭于相异的角色丛[⑥],当面对不同角色场景时,处于不同地位的个体行动意愿既受到文化价值和情境的囿限,又需以满足社会需求为行动动机,依照标准化角色期待实现角色义务与需求意向之间的协调互动,角色期待与需求意向的脱节可能导致越轨行为的发生。倘若个体行动者经过社会化学习并内化了角色期望,则可依据其所处的社会类型做出适当抉择,亦可根据价值观与标准化期待等信息对行动进行预测[⑦],以此来精确地区分行动者的不同角色期待和关系结构,并展示出个体在社会关系中的身份地位及行为模式间的内在联系及动态互动过程。这既反映于社会分化与变迁过程中行动者在不同类型角色场景中的适应转换,也体现于个体角色在不同社会地位间的重新分配和调整。

教育承载着培育符合社会期待、契合社会需求的"理想成人"的重任[⑧],引导个体逐步认知自身在群体及社会结构中的多元位置,领悟并遵从社会对不同社会地位的角色期待[⑨],学校作为制度化分配与选择角色的机构,促使个体行动者不断地调整自身角色定位与行为模式,以适应新的角色期待和需求意向,通过教育活动来构建维续社会稳定的社会角色分类机制,实现社会结构的优化与协调。个体行动者通过社会化与角色分配,承担起满足社会需求的社会角色,从而促进了不同"地位—角色"间组织系统及其行动者的良性动态互动,依此个体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与社会的和谐共生。

---

①塔尔科特·帕森斯:《作为一种社会体系的班级:它在美国社会中的某些功能》,张人杰主编:《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18-437页。

②塔尔科特·帕森斯:《作为一种社会体系的班级:它在美国社会中的某些功能》,张人杰主编:《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第420页。

③乔纳森·H. 特纳著;邱泽奇,张茂元等译:《社会学理论的结构》,第36页。

④乔治·瑞泽尔著,刘拥华译:《当代社会学理论》,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21年版,第66页。

⑤刘少杰:《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第157页。

⑥埃米尔·涂尔干:《教育及其性质与作用》,张人杰主编:《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第8-9页。

⑦鲁思·华莱士,艾莉森·沃尔夫著,刘少杰等译:《当代社会学理论:对古典理论的扩展》(第6版),第22-29页。

⑧埃米尔·涂尔干:《教育及其性质与作用》,张人杰主编:《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第8页。

⑨谢维和:《教育活动的社会学分析:一种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2页。

三、分合边际的厘定逾越

社会秩序问题的研究经历了由总体结构到部分系统,从外部强制到价值内化,由分合交替至相互交融的演变过程。然而在追求平衡的过程中,过于重视宏观结构建构而忽视个体互动,过分注重社会和谐而忽略社会变迁与矛盾的复杂运作过程,使其无法超脱西方现代性的社会桎梏,受到后续理论发展的反思质疑。

(一)多元系统的失谐

社会分工作为推动社会结构复杂化的驱动力,不仅促进了社会系统的深度分化,还催生了多个功能各异、相互依存的子系统。各子系统在承担新的社会职能同时,在与外部环境持续互动与适应的过程中,不断优化自身的结构和功能,社会分工与子系统的形成和发展,构成了社会运行的重要微观基础。从涂尔干的经典理论视角出发,分工的深化导致了个体间差异的增加,但同时也极大地增强了社会团体间相互依赖的紧密程度。对于社会系统的维持而言,涂尔干强调应将关注点聚焦于总体社会的运行,而非被群体间的不协调、矛盾所干扰。在帕森斯的理论中,社会分化出的政治、经济、文化模式托管系统、社会共同体各系统之间相互联系,这些子系统虽各具特色,但彼此间存在着同一性与相容性,系统间通过自发调适来实现社会的均衡整合。然而,在实际的社会运行中,此种理想状态面临着诸多复杂境况,任何系统都不是孤立地展现,系统间的渗透与排异是同时存在的。社会各子系统中,人格系统与文化系统的互动尤为复杂:人格系统通过文化系统内化,以满足社会系统功能需求。在此过程中,文化系统为人格系统提供指引,塑造着个体思想和行为模式的同时,反过来也会压抑人的本能,限制人的自由,一定程度上产生对人的异化和扭曲,表现为文化与人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对抗关系,这也是社会复杂性的重要体现。相较于帕森斯侧重解释社会系统的稳定性和秩序,默顿更加注重社会问题和社会变迁的功能分析,深刻洞察到社会变迁的动态性,更为强调分析客观的社会后果。洛克伍德在承袭帕森斯从系统与行动者的能动视角分析社会系统的基本理念的基础上,对"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进行明确区分,深化了对社会系统内部动态关系的理解,主张"社会整合关注的是行动者间有序或背反的关系,而系统整合则侧重于构成社会系统各部分间有序或抵牾的相互关系"[①]。拉尔夫·达仁道夫则明确否认社会组织是追求均衡的社会系统,在现代社会结构中,由于"应得权利和供给,政治整合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大之间存在着对抗关系"[②],社会结构中固有的不平等权威分布频繁引发社会矛盾。在现代社会复杂多变的环境下,只要社会存在分化并且分化严重,社会内部必然出现高度紧张局势的升级[③]。社会本就处于不断变化的系统中,各子系统间的目标和利益纷争加剧,使得结构功能主义在解释社会力量的动态博弈和不协调方面可能显得捉襟见肘,强调静态结构均衡的整合方案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难以兼顾各方利益,甚至可能引发新的社会问题。

(二)价值体系的消解

在社会的持续分化与快速变迁中,多元文化及其纷繁复杂的价值观念强烈冲击着传统价值体系,不仅动摇了既有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的根基,更引发了社会成员在价值观念上的显著分歧与碎片化。随着传统价值体系的解体,新的社会结构尚在摸索构建之中,与之相适配的价值观念也未能完全确立,社会成员在价值认同上出现了多样化和个性化趋势,不确定性加剧了同一集体意识和共同价值的构建难度,亦使得集体行动的协调和组织面临异化的挑战。然而,帕森斯过分强调复杂社会系统对共同价值体系的需要,乐观地认为西方文化的内核——卡里斯玛终极价值能够化解

①吴晓林:《社会整合理论的起源与发展:国外研究的考察》,《国外理论动态》,2013年第2期。

②拉尔夫·达仁道夫著,林荣远译:《现代社会冲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③吴晓林:《结构依然有效:迈向政治社会研究的"结构—过程"分析范式》,《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2期。

那些因“具体性”现代性问题而产生的种种矛盾,将共同价值体系置于社会稳定的核心位置,“社会群体的整合关键在于其成员们对某一套自成一体的规范达成一致认可,并赋予其道德上的权威,只有这样,社会才能成为一种稳定的‘道德共同体’”[①]。卢曼则以系统功能论的视角,指出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化,整个社会系统也变得愈发复杂,个体在道德和情感上对社会结构的依附并非社会整合的必要条件。在复杂社会系统的大部分领域,想要回归到像涂尔干所倡导的紧密共同体,无疑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相较于涂尔干与帕森斯对社会整合共同价值以及个体在道德和情感上对社会结构依附的着重强调[②],卢曼主张强化各系统自身的内在功能,社会系统的主要功能之一即是对复杂性的化约。在复杂的系统中,秩序并非像涂尔干与帕森斯所言是依靠共同的价值观念、信仰规范的一致性来维系的,而是建立在分化后系统成员间密切的交往之上,这种交往不仅能有效化解环境系统分化的风险,亦可在多元价值体系中寻求一种动态的平衡[③]。在当前复杂多元的社会环境中,不同价值体系之间的碰撞与交融,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文化图景,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使传统价值观念的权威性受到挑战,带来价值混乱与错位,致使社会成员在价值选择上变得无所适从,关系也因此变得愈加紧张和脆弱,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分化与不稳定。多元化的价值体系肆意生长,不仅挑战着主流价值观念的权威地位,更在无形中进一步扰乱了价值体系的秩序,使得整个社会价值领域陷入更加复杂与混乱的局面,加大了社会整合的难度,严重影响了社会的正常运行和有序发展。

(三)社会地位的区隔

社会系统始终处于持续分解与重组的动态过程之中,这一过程作为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深刻地塑造了社会地位的形成和分化格局,影响着社会结构的稳定性与流动性,也映射着社会变迁与转型的轨迹。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来看,社会地位差异的出现被视为满足社会需要,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必然存在。社会不同群体通过承担不同的社会角色、履行特定的职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与社会功能相协调,从而反映出社会的共享价值观与集体目标。每一个社会都会因需要整合、协调和团结而产生社会地位的分化,正如涂尔干所言,适当的人去承担适当的职业角色,以获得相匹配的报酬[④],这是社会分工的一种理想模式,也是功能论分层观点的重要依据。然而该理论在强调社会总体功能优化的同时,呈现出在解释微观个体与群体需求多样性以及不平等问题方面的局限性。在功能主义的理论框架下,戴维斯和摩尔认为社会分化是为了满足复杂社会系统的功能需要[⑤],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社会内部不同社会群体利益需求的多元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不平等可能对社会稳定与和谐带来的负面影响。滕尼斯指出,现代社会的关系实际上主要是通过契约和交换确立起来的,随着城市的兴起与社会流动的增强,传统社会团结的基础必定削弱,社会“地位—角色”的分化将更加显著,此时基于利益分工协作的有机整合较难达成,财富垄断和社会地位分化不可避免[⑥]。此种现象类似于涂尔干绘制的西方国家在社会转型期所遭遇的劳资矛盾、经济危机的社会“失范”图景,也是不同社会群体间利益对抗的社会关系矛盾的体现,既表征出社会结构层面的功能性失调,更深层次地揭示出社会地位的差异在某些情况下不仅未能有效缓解这些矛盾,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与区隔程度。由此可见,对于社会地位差异的理解,需要超

①帕森斯著;张明德,夏遇南,彭刚译:《社会行动的结构》,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433页。

②乔纳森·H. 特纳著;邱泽奇,张茂元等译:《社会学理论的结构》,第55-64页。

③乔纳森·H. 特纳著;邱泽奇,张茂元等译:《社会学理论的结构》,第68页。

④埃米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第111页。

⑤Davis K., Moore W. E., Some Principles of Stratifi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10, No. 2, 1945, pp. 242-249.

⑥李培林,苏国勋,张旅平等:《和谐社会构建与西方社会学会建设理论》,《社会》,2005年第6期。

越单一的功能论视角,关注社会结构内部的异质性对社会变迁的影响。马克思倾向于强调不平等的经济基础对社会秩序的影响,韦伯认为权力、财富与声望作为衡量社会流动程度的变量时扮演了引发社会矛盾的关键角色[①],明确指出社会不平等是社会结构固有矛盾的产物,而非功能优化的必然结果,将焦点转移到了社会矛盾对社会变迁与整合的作用之上[②],为更全面地把握其背后的复杂社会机制提供了新的维度。

四、分合均衡的策略重构

面对社会结构、利益分化、价值多元与社会整合的张力,保持二者的动态均衡,成为摆脱现代社会秩序困境的关键路径。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中,结合现代化进程中发展和秩序的张力结构,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中国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的关系、理论与经验的关系,发挥教育在"现代性工程"中的强大整合功能,实现教育与社会的互嵌耦合,在中国语境中探寻分合均衡的秩序适应与重构策略。

(一)组织嵌入的功能性整合

在现代社会的复杂架构中,各社会系统均与典型的社会实体相对应。政治系统对应国家或政府机构,文化模式托管系统对应学校,经济系统对应企业、市场,社会共同体系统则对应公民社会和法律部门,其中教育被看作是文化系统的一个子系统[③],作为将个人整合于社会的重要机制[④],自产生伊始便肩负保证社会延续的基本职能[⑤],日益成为塑造社会形态的主导与根本制度。国家、市场、社会组织、学校或所称的"社会共同体"作为现代社会的实体性组织结构联合构成社会秩序生成的逻辑体系,各组成部分分工明确,各司其职[⑥]。然而,当前我国仍存在社会组织的功能性不足的状况已影响到社会整合与社会和谐的发展,实现各系统间的协同联动,确保各系统能够有效地发挥自身功能,优化不同社会实体间的交互模式,对于构建一个紧密且稳定运作的社会体系至关重要。这一目标的实现既依赖于外在的强制力量或单一的宏观结构设计,更需要各子系统通过嵌入式的深层合作,来实现功能的协同与整合。在此种整合理念下,国家、市场、社会组织(职业团体等)、学校及个体基于共同利益和目标搭建"伙伴式关系",通过复杂的关系网络紧密相连,共同作用于社会系统的总体运行。拥有"制度权威"的国家,作为社会秩序的宏观调控者,通过政策引导和法律法规保障,促成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平衡与协调;市场以其灵活高效的资源配置方式,通过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为教育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与经济支撑;扮演着桥梁与纽带角色的社会组织,既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又促进公众参与社会决策,以弥补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及服务提供上的不足。教育制度彰显着符合社会主义制度取向的价值观念[⑦],学校通过教育改革与素质教育实践,依托对国家、社会各种可见符号和观念的传播,传递国家意志和社会权威,增强受教育者对制度的认同感。学校所传授的官方知识深刻反映主流价值取向,藉由官方知识指导下的知识传授,推动文化价值的传承创新,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义务感和创新能力的未来社会成员。教育作为推动社会化的重要机制,无疑发挥着至关重要的社会政治功能,社会各系统协调运作,增强社会凝聚

①乔纳森·H. 特纳著;邱泽奇,张茂元等译:《社会学理论的结构》,第126-129页。

②乔纳森·H. 特纳著;邱泽奇,张茂元等译:《社会学理论的结构》,第125-140页。

③帕森斯著,梁向阳译:《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37-38页。

④钱民辉:《教育社会学:现代性的思考与建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7-79页。

⑤吴康宁:《教育社会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118页。

⑥刘少杰:《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第47-48页。

⑦谢维和:《教育活动的社会学分析:一种教育社会学的研究》,第564页。

力、向心力,推动社会稳定与和谐。正如卢曼强调,社会的进化正是建立在社会系统与外部环境持续互动分化与适应之上[①],通过社会各系统的联动力量,社会能够不断在互动和适应过程中协同运作,实现更加和谐与稳定的发展。

(二)文化负载的认同性整合

现代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进行着政治、经济层次的分化,却很难实现文化层次的整合。在马林诺夫斯基看来,文化的产生旨在满足生物的、社会的以及整合的人类社会发展需求[②],文化系统作为能够整合人格系统和社会系统的符号系统,扮演着行动者互动的中介角色。以规范、共同价值为表征的文化引导行动者将其内化为自觉的行动准则,文化就成为社会整合的主要着眼点。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内化即社会化过程,始终保持对社会文化传递和延续社会生活的认同[③]。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共享的"核心价值",在寻"根"中知己之长,在内生于本土"文化自觉"中实现从文化引进到文化输出,坚持文化的自主性,是"中国文脉"的继承与延续,也是文化认同的土壤和原动力,更是中国文化自信的立足点和切入点。为使优秀文化传统成为社会成员的日常认知与行动逻辑,需将核心价值的文化认同渗透于家庭、学校等社会化机构中,强化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培养。在费孝通看来,"文化自觉"不是要"复旧",而是实现对现代化的"自主适应",选择、吸纳、挖掘本地文化与现代化规律相契合的要素,取长补短[④]。教育作为具有模式维持功能的文化系统中一个重要子系统,面对现代性情感异化与价值多元,除了承担政治教化的功能外,在文化传承与认同的链条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社会只有在其成员间存在足够的同质性时,才能继续存在下去"[⑤],教育的"文化印记"使其传递的文化内容、行为准则、信仰、理想等在原则上必然与人们共同遵循的社会标准相契合。家庭作为个体初级社会化的重要场所,父母通过言传身教、情感渗透、文化熏陶与氛围营造,将共享的文化价值观念及行为规范传递给儿童;学校作为次级社会化典型的现代环境[⑥],借助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取向的课程设置以及实践活动,进一步巩固深化主流文化价值观念,藉由文化符号、仪式等所产生集体表象的力量,召唤与表达共同的信仰及情感,学校协助儿童接受并内化社会集体意识所确证的共同价值[⑦],形塑其价值观与行为模式,强化国家认同感与归属感。对于现代学校而言,学校通过系统的课程设计和教育教学活动,引导学生深入理解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深刻内涵,并将其内化为自身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追求,使学生更好地实现从"校园人"到"社会人"的转变,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使其符合社会的期待,正是教育社会化功能的外显。

(三)制度弥合的结构性整合

制度与秩序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制度是秩序的具象表达,它将抽象的秩序概念通过具体的规则、规范等形式呈现出来;秩序是制度的内在旨趣,是制度设计与实施所追求的目标状态。倘若功能性整合是秩序构建的外部条件,认同性整合是秩序达成的内部动力,结构性整合则是秩序维续的坚实基础。随着社会系统结构不断分化、分工日益多样化,社会各群体的利益结构正经历着深刻重组,这一变革交织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使得社会团结越来越难以完全依赖社会生活中纯朴的"归属感",转而更多依赖于国家的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社会利益结构受到国

①乔纳森·H. 特纳著;邱泽奇,张茂元等译:《社会学理论的结构》,第56-67页。

②帕特里克·贝尔特著,瞿铁鹏译:《二十世纪的社会学理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30-42页。

③谢维和:《教育活动的社会学分析:一种教育社会学的研究》,第261页。

④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思想战线》,2004年第2期;苏国勋:《社会学与文化自觉——学习费孝通"文化自觉"概念的一些体会》,《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

⑤埃米尔·涂尔干:《教育及其性质与作用》,张人杰主编:《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第7-8页。

⑥杰弗里·亚历山大著,贾春增等译:《社会学二十讲》,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

⑦谢维和:《教育活动的社会学分析:一种教育社会学的研究》,第564页。

家通过集中分配资源与权力制度的根本性制约,依赖制度的力量来化解社会利益结构的不平等难题是至关重要的。通过优化资源配置,积极推进以户籍、就业、人事和社会保障制度为核心的制度变革,可以有效破除阻碍社会成员流动的制度及非制度屏障,有助于协调各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合理流动,打破固化的结构格局,实现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社会地位—角色的动态平衡互动,推动社会朝着稳定有序、充满活力、公正合理的现代社会迈进。在制度变革的进程中,教育制度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成为塑造社会形态的主导与根本抓手,学校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承担着传统意义上对学生个体的社会化培养职能,赋予其适应社会生活所需的知识、技能和价值观,日益成为人力资源累积的关键机构。教育系统通过评估学生的实际成就,对学生进行选择并将其分配到不同的社会位置上,使他们最终能够承担起社会组织系统的不同责任角色①。尽管高等教育普及化弱化了"文凭信号",教育资源在区域间、城乡间,甚至校际间的配置失衡,但教育作为社会选择与人力分配的"筛选机制",仍是开发人力资源,形塑橄榄型社会结构,促进社会流动的重要路径,通过调整和完善社会结构地位,实现社会结构的合理优化,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五、结语

现代性所引入的生活模式,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使我们脱离了所有类型的传统社会秩序②。鲍曼认为,现代性表现为对秩序的一种永无止境的建构,是对秩序化的追求,随着现代社会快速变迁与高度流动,作为结构性存在的社会秩序同样经历着由混乱到稳定,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在现代性叙事体系中透过结构视角进行社会秩序的本质追问和维系机制的过程探寻,对于破解现代性危机具有重要意义。对秩序维系逻辑的厘清表明:社会结构以不同形式及互动类型嵌套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共同作用于秩序维续的运作过程;研究视野从居于决定性地位的社会总体结构逐渐转向分化的社会系统内部;社会成员间的联结由具有外在强制性的集体意识转为内化的共同价值体系;国家、社会组织与社会成员间被显现与隐含交错的关系网络模式互构起来。对社会秩序维续过程的深度把握,有助于在分化—整合的交替中,透过功能主义者的"秩序情结",去理解现代"社会"的社会性,更重要的是要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实践"对话。社会各领域间在国家主导的现代化建设框架下不断发生着变革、互动与内在协调,各领域间的内在秩序也在相互确证、彼此关联中被建构起来。组织、文化、制度的变革与整合为治理主体的策略性行为提供了空间,通过社会各组织间的相互嵌入、协调合作,各领域间的壁垒被打破,社会关系得以联结;文化认同与文化自觉帮助建立共同体意识的基本秩序,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力量和智力支持;对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有助于优化不平衡的利益格局,实现国家、社会、个体间的良性互动。教育作为社会整合的强有力工具,对组织、文化、制度更要予以积极回应并主动作为,它的使命和功能,就是在日益分化的社会中建立和维系团结和一致③,通过加强教育与社会各领域的联动与协作、促进文化交流与融合、深化教育改革与创新等方式,共同为构建更加和谐、稳定、有序的现代社会秩序贡献力量。对于迈向下一个百年的中国,社会秩序的良性运作是政策制定、学术研究的焦点,社会秩序的演进蕴涵着对现代性社会危机的深层忧虑和对制度化社会结构的深切关注。植根中国语境,实现分化与整合的动态均衡,发挥教育强大的整合力量,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诉求,也是对"现代社会向何处去"的深层拷问与积极回应,更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纵深发展的中国力量。

[责任编辑:杨　旻]

①钱民辉:《教育社会学——现代性的思考与建构》,第49页。

②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修订版),南京:译林出版社,2022年版,第12页。

③谢维和:《教育活动的社会学分析:一种教育社会学的研究》,第36-39页。